

民主知识分子的媒介实践与 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

——以邓初民为个案的考察(1915-1949)

张原

【摘要】民主知识分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群体,邓初民先生便是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他一生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研究、革命实践和传播活动。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宏观语境和历史视域下,邓初民的媒介实践显现出三方面的特点:其一,这是20世纪早期民主知识分子进行知识传播的自觉行动和思想启蒙;其二,体现出政治传播的鲜明特征和历史轨迹;其三,为社会动员和鼓舞民众投身革命提供了思想动力。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这三个特点又构成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路径:进行知识传播和参与政治传播的历史特征和价值。

【关键词】邓初民;马克思主义;媒介实践;知识传播;政治传播

【作者简介】张原,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原文出处】《新闻与传播研究》(京),2020.1.5~20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和革命旗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路径。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一批民主进步知识分子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之一发挥出独特的历史价值。从理论层面和媒介技术层面看,他们是当时社会的知识精英,他们中既有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不乏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者和理论家,拥有运用现代传媒的自觉意识和能力;政治身份上,他们身处中国共产党的外围,但又与其保持着密切联系。与此同时,在学术理念上他们都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执着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从一定意义上,他们的媒介实践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以及对中国政治道路的选择作出了积极贡献,具

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邓初民先生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邓初民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和宣传家,他一生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革命实践,曾先后创办和参与了不同类型的进步报刊,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一实践活动促进了他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成为邓初民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宏观语境和历史视域下,邓初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媒介实践活动显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这是20世纪早期民主知识分子进行知识传播的自觉行动和思想启蒙;其二,体现出政治传播的鲜明特征和历史轨迹;其三,为社会动员和鼓舞民众投身革命提供了思想动力。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这三个特点又构成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路径:进行知识传播和参与政治传播的历

史特征和独特价值。

一、知识传播:思想启蒙与学术论争的双重路径

“邓初民是在中国较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主张的学者之一”^①,是“坚强的民主教授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②,“他将马克思作为自己的终身信仰,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③他以学者的身份,始终将大学课堂、著书立说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阵地,并以进步知识分子的自觉和担当,运用现代大众传媒,深入工人、学生和普通民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拓展和扩大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知识传播和思想启蒙的范围和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面临着内忧外困的局面,民主知识分子纷纷创办报纸、出版书籍,主要目的是“延续了‘唤醒中国’的历史使命,发挥了‘召唤’主体的独特作用”^④。这一时代命题内嵌于中国早期大众传媒发展的历程中。可以说,这种内涵同样贯穿于这一历史时期邓初民的媒介实践中。同时,这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特征之一。

然而,邓初民的媒介实践在此基础上又显现出两个特殊之处。首先是具有“学术传播”的内在特质,这与其学者的身份密不可分,他作为学者的学术思想、话语以及所具有的身份特征是这一历史活动的重要侧面和主要内涵之一。邓初民和这一时期的一批进步民主知识分子作为当时极为重要的学术力量,自觉主张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知识传播,使之呈现出作为知识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样态;其次,这些媒体实践从文本内容上看,又显示出邓初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力量进行阐释,并预设中国革命道路前景的学术贡献,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革命实际紧密联系,从而超越了单纯的学理介绍。这种学术路径也显示出这批民主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从学术研究走向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最终成为他们政治选择的历史轨迹。

(一)以信仰为基推动马克思主义学理性的知识传播

“中国早期先进分子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作用,找到了拯救中国的良方,一下子振作起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稍有了解,特别是对其基本原理有了初步掌握之后,就用来考察中国的问题,就有了自觉的意识。第一个提出这个思想的就是李大钊。”^⑤邓初民参与创办的第一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刊物《民彝》,就是与李大钊等人在日本创办的,该刊是“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会刊。他与李大钊等人领导和参加了留日学生反对“二十一条”的抗议活动,组织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并任总会评议会会长。1916年5月《民彝》创刊,刊名由易象拟定,意为“民之秉彝,好是懿德”^⑥。邓初民与李大钊、高一涵三人共同担任编委并撰写文章。《民彝》共出版三期,邓初民主编了第三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邓初民的《学生之声》等文,1917年2月该刊遭到日本当局压制被迫停刊。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群体之一,在这本刊物上他们积极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斗争活动,唤醒学生的革命意识。在他主编的第三期《民彝》中,运用各种报刊体裁,迅速响应革命号召,探讨国是、呼吁民众参与革命活动,并采用“对话”的方式表达革命主张,体现出鲜明的革命精神和主体性。此外,该刊还刊载了章炳麟、易象等人的多篇文章。

在“五四”运动的时代洪流下,马克思主义通过与其他思潮的竞争跃升为时代的主流思潮在中国崛起,邓初民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在此期间逐渐走向社会主义,他积极投身到当时新文化传播的媒介实践中,并以个人的学术影响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传播,带动和影响了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5月1日,在山西任教的邓初民与马鹤天等人在太原创办了山西学术研究会和会刊

《新觉路》(半月刊),后改为月刊。邓初民拟定了刊名,并接任主编。这本刊物以介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报告劳工运动概况,宣传劳工神圣为宗旨。该刊还及时报道了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工人革命运动,邓初民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进行了介绍,成为这一时期山西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有影响力的进步刊物。张友渔当时是这本刊物的学生编辑之一,他曾回忆:邓初民同志那时就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启蒙宣传^⑦。《新觉路》的创刊号上刊登了邓初民的《怎样改造中国》,在文中他说:“断言怎样改造中国的问题,敢说就是打破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创造社会的新组织。”^⑧他又在该刊的第2卷5号上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专政与普通的民主》等文章。

事实上,邓初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媒介实践始终包含着两个面向,其一是大众性传播,其二是学术性传播。后者在学理层面的科学阐释又成为前者重要的文本来源和理论基石,这种学术传播是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多种媒介活动中的核心内容,并成为他进行革命实践的重要武器,以及他传播马克思主义媒介实践的特色之一。这种一脉相承的学术思想,同样显示在他于1946年创办的《唯民周刊》中,该刊开办了翦伯赞、侯外庐及邓初民三位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栏。与此同时,从1929年至1949年,他先后出版马克思主义学术论著13部。“邓初民同志的这些论著,特别是解放前的一系列专著,以及在大学的讲课,向社会的宣传,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占领阵地,启发千百万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⑨这些著作都完成于相当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环境下,从内容上来看,首先,“他十分注重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如《社会发展史简明教程》《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其次,他还非常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1948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常识讲话》就用了很大篇幅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⑩。这本著作也是为新中国成立,推动马

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而作。从学科体系来看,“他为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⑪,1929年,邓初民的论著《国家论之基础知识》,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同年9月,昆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政治科学大纲》,这本论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政治学的性质、概念、研究方法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体系的基本框架,为中国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开拓性的学术探索^⑫。“以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阐释唯物史观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该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邓初民主编的《政治科学大纲》,是中国人初步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开端。”^⑬在民国时期,从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末,围绕“政治学原理”展开的理论纷争中,这本著作形成了较为完整、科学和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学说。“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近代国家意识和现代学科意识的驱使下,一个由中国本土学者组成的研究群体开始出现,如恽代英、邓初民、秦明、高振青、傅宇芳等,他们以丰富的著述和系统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以学科体系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由此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初建任务,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服务。”^⑭《政治科学大纲》因颇受欢迎在当时连续出版了三版,与此同时,这一论著又在学术路径上影响了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的研究。1940年他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新政治学大纲》,1946年,该书由生活书店再版。再版中,邓初民把1945年出版的著作《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中《民主政治的新趋势》一文的部分内容作为附录加入,使《新政治学大纲》的理论体系更加完整^⑮。对于这本著作的研究目的,邓初民明确表示是为实践而作的:“我对于这本政治学不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政治学来处理的,而是把它当作政治家、革命家的政治的战术战略或革命的战

术战略来处理的。”^⑥这本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结合的重要学术成果,邓初民与这本著作的贡献主要体现为,“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取得了该学科的标志性成果。如李达的《现代社会学》、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等一大批各个学科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学术经典,初步构建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⑦。《新政治学大纲》被认为“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史上的里程碑著作”^⑧。

(二)以科学之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学术论争中占居主体地位

20世纪初,在中西方各类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的中国社会,现代报刊成为了思想传播和论争的主要中介和载体。这种知识传播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术传播”的主要特征。“五四运动后,伴随着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展开,马克思主义开始整体意义的对华传播,特点是自发的学术传播。所谓‘学术传播’,就是在众多的思想流派当中,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交锋与对话。”^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不仅有思想交锋,而且这种思想交锋也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愈发凸显,使马克思主义传播更加广泛,形成在思想交锋中的传播”^⑩。现代报刊不仅使思想交锋在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时显现出现代传播时效性的优势,也为文化话语方式的转变,以及更为深入的介入政治和其他社会领域提供了思想传播的平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党派斗争、思想斗争无处不在,通过报刊进行论战,也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邓初民在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文章,其中以论争为目的或具有论争性特点的文章占到了相当比例。其核心仍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阐释和分析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现实。1923年邓初民在当时著名的文

化期刊《东方杂志》发表了《政治问题之根本讨论》《土地国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普通民主》等文,成为当时对中国发展道路学术论争和思想交锋中重要的代表和声音。他指出:“中国政治的归宿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未完成以前,只是混沌即以混沌,一切努力,都不过是增加一些混沌罢了。”^⑪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前瞻性地论述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可以说是较早对中国革命道路前景进行了学理阐释和大众化传播。

1928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展开了一场影响极大的思想论争,即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并进一步在哲学领域开展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论争。这一论争即是知识分子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学术思考,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国民党之间的又一思想斗争。尽管在此期间各种学术思想、政治立场、斗争策略极为复杂多元,但是却成为马克思主义影响中国的一场重要思想论争。在这场论争中,邓初民不仅通过其他媒体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观点,还创办期刊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阵地和声音,这一刊物成为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性媒体。1928年6月,他和李达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双十月刊》,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刊登了他和李达的《土地问题研究》《革命过程中的民主革命》,以及许德珩等人的文章,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进行交锋、对话的重要舆论空间,这本刊物于1929年1月停刊。然而,这种论争伴随着革命斗争的展开,也逐步走向深入和扩大化。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发生的著名思想论战,学界称之为“新社会科学运动”,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关于中国将向何处去的论争都是极为严峻的,邓初民与一大批先进民主知识分子以他们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说,推动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科学姿态占居思想理论界主体地位的历史。

从知识传播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自身的知识理论水平无疑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传播的效果。也因此,邓初民在学术上的理论造诣,使其在传播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具有了特殊的优势和强大的说服力。同时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学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初民通过这些媒介实践,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走出课堂、走进中国革命实践,走向了广泛的民众,开拓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学理性探索和运用,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分析,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在媒体表现形式上,也从报刊扩大到书籍。邓初民曾先后创办过多个出版社,都因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而被国民党当局在较短的时间内关停,其中不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译作,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性论著。从宏观历史背景来看,这些出版社又是他们参与当时思想论争重要的传播平台,其著作也是他们进行思想论争的有力武器和重要代表。1928年11月,他与李达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昆仑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进步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其中包括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民族问题》,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等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陈启修译)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上册(钱铁如译)、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古典哲学之终结》(杨东莼、宁敦武译)、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李达、钱铁如译)、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李达译)等重要马克思主义译作。为配合当时抗日战争形势还出版了《反对帝国主义丛书》。其中尤以李达的《现代社会学》与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最具有开创性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面对新的革命任务和政治局面,理论界也展开了各种思想、思潮的论争。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1945年7月,邓初民得到友人帮助,在重庆创办了文治出版社。他邀请潘梓年、张友

渔、许涤新等人撰写政治、哲学、经济、法律等方面的著作,凝聚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家,这些作品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和影响力做出了积极贡献。在这一历时期,重庆集聚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构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学术阵营,他们在学术上彼此呼应,相互扶持,以报刊、书籍为媒介交往,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创造了新的文化空间,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占领主流阵地和中国革命实践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与此同时,这一阶段也是他自身学术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他又通过创办报刊、出版论著、撰写文章、创办学校、演讲等多种方式转化学术话语,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趋势,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形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从传播的表达特色来看,邓初民深入浅出的传播方式与极富感染力、号召力的宣传方式,使他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广受不同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的信任和欢迎,田汉曾写诗赞扬邓初民的传播水平:“自有人如铁,怜他卒过河。几声狮子吼,掀起大江波。”^②1921年至1925年,邓初民在山西期间不仅是一位学者、主编,同时还兼任《山西日报》的记者。其实,早在1919年李大钊任《晨报》主编时,仍在日本留学的邓初民受邀为该报撰写通讯。记者的职业身份缩短了他作为学者和民众之间的知识距离,丰富了他的话语传播方式,加深了他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体认,使其不仅以学术的思路阐释马克思主义思想,还以记者的社会视角和身份关注和解读中国社会和革命活动,并形成了他朴素、明了的语言风格,这也成为贯穿邓初民一生学术研究的重要特色。这种对受众的贴近和重视,同时也表现在他的书籍出版理念上。在谈及《社会科学常识讲话》这本著作的写作目的时,他说“本书是以初学社会科学的读者为对象,介绍关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因此,他“在文字上力求浅显明了,使

它适合读者的需要”^⑧。

综上所述,从知识传播的视角来看,邓初民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贡献可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术体系和学术话语的构建;运用现代传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向民众的大众化传播和思想启蒙。事实上,在学术传播和论争的背后,也蕴含着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从一定意义上看,邓初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播与其政治传播之间也不是绝对分隔的,而是在传播实践中有着各自的侧重点,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传播实践成果之间内在的关联,显现出他学术思想和革命实践不断走向成熟的路径。

二、政治传播:双重政治身份下战斗性与策略化的媒介实践

邓初民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始终怀有关心中国革命斗争的自觉,将他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现实紧密结合,这种行动方式和传播策略使他走出了学者的单一身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走出了学理探讨的单一层面,并以社会活动家和民主知识分子的身份投身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活动的政治传播中。

民国时期,一批民主知识分子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重要的社会舆论力量和意见领袖。这些知识文化界民主人士从多个侧面参与和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们由此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各种历史渊源并建立了诸多联系,其中一部分还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重要革命力量。邓初民以民主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曾参与过一些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工作。由于这些媒介实践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和明确的政治目的,从本质上来看实则就是政治传播。此外,他作为我民主党派早期的重要参与者、知名代表和领导者,又具有民主党派的政治身份,以此身份他所从事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媒介实践,从其主要内容来看,尽

管政治身份不同,但基本立场和内涵却是与前者大体一致。然而由于受众和他自身政治身份的区别,因之本文在此分别展开论述。

(一)以民主知识分子身份参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媒介实践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兴起了一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科学思潮。从政治上看,大革命之后的共产党面临着国民党及其思想派别的攻击和围剿,因此组织自己的文化力量,大力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自己的思想路线和行动主张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1929年秋,中共中央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以统一对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1930年5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下,由邓初民等人共同发起,潘汉年等共产党人参与组织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社联的主要活动是团结广大的进步知识分子,出版刊物,组织读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学生和工人中开展业余文化教育。”^⑨它与“左翼作家联盟”一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健康、系统、全面地传播提供了相对的组织上的保证”^⑩。社联在纲领中明确了自身的任务和目标,其中就包括了“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⑪。1931年,邓初民被选为社联主席。

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当时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新型传播方式,更重要的是它还是革命的武器。社联结合中国的革命现状,以通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先后创办了《文化批判》《思想月刊》《新思潮》《社会科学讲座》《社会现象》《读书生活》《研究》等期刊,其中《新思潮》是社联的机关刊物,该刊和《社会科学讲座》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成为马克思主义

与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前沿阵地。然而这些刊物出版发行都十分短暂,有的只发行一期就被国民党停刊,但是它们却成为这场社会思潮中最重要的传播渠道和舆论平台。与此同时,社联还出版和译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重要论著。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出版于1931年。这一时期也是邓初民论著较为丰硕的时期,1931年由神州出版社出版了《社会进化史纲》,1932年他以田原为笔名,由新时代出版社出版了《政治学》,这些著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科学系统的对政治学原理的论述,与之前的《政治科学大纲》构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粗朴体系,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在理论战线上,他们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假马克思主义围绕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三个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⑦,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了突出的介绍和传播。在这场思想斗争中,“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还团结了一批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想家和革命知识分子,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通过对马克思理论的传播,使这些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和学科体系的建立得以发展,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理论思想的确立奠定了基础^⑧。1930年7月,邓初民还曾与鲁迅、潘汉年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⑨机关刊物《自由运动》(半月刊),仅出版两期便被迫停刊。抗战爆发后,邓初民在中山大学自觉投入到抗日宣传和革命活动中。他与何思敬等人创办了主张团结抗日的进步期刊《新宇宙》(1935年)及其他进步刊物,同时还是这些期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36年他应广西大学聘请来到广西,共产党人张云逸与他取得联系,他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工作。

1937年11月,他与孔庚、马哲民、黄松龄、孟宪

章等人于11月8日在武汉创办了《民族战线》周刊,这本期刊由孔庚任发行人。该刊是一本综合性刊物,在征稿启事中表示,“尤其欢迎战斗性文艺及战地通讯”,体现出鲜明的战斗性。这本期刊有着国共合作的鲜明特征,作者、编辑、发行人即有国民党高级军官,也有中共重要领导和进步民主知识分子。他们邀请时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撰写了《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一文,文章主要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创刊号上刊载。邓初民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论政治动员》《互相了解互相认识》《救亡热情与救亡的认识》《怎样实现进一步的统一团结》等文章,论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国共两党合作,加强团结,统一抗战救亡的认识,号召动员全体人民团结一致,积极投身到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中去。马哲民也先后写了《一论抗战时的党派问题》《现论抗战时的党派问题》等文,此外,还刊载冯玉祥、黄松龄等人的一些抗战诗文。该刊的出版,打破了湖北沉闷的政治空气,激发了人民投入抗战的热情。1937年11月下旬,《民族战线》杂志社为研究抗战期间存在的问题,邀请从平津沪莅临汉口的文化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田汉、范长江、沈钧儒、王昆仑、杜重远等一百五十余人参会。沈钧儒对抗战各项问题作了详细分析,并对动员民众的各项工作提出其不足及改革的方法。最后,由邓初民综合大家意见,形成会议决议,其中包括“扩大动员民众、革新政府机构,充实抗战力量”等进一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救亡运动的意见^⑩。1938年该刊停刊。

邓初民作为一名知名社会科学家,他的学术活动跨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等多个领域,抗日战争期间,在党的领导下他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为抗日救亡开展了各种宣传工作。1938年,他还与马哲民、黄松龄三位民主教授在朝阳学院创办了一个小型刊物(名称不详)^⑪。这本刊物由他们三位教授撰稿,主要内容是在学生中进行抗日动员

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朝阳学院也因集聚了“邓马黄”三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教授一时成为成都抗日救亡、民主革命的宣传重地而颇具影响。抗战爆发后,一批身在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党的领导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中苏文化协会等组织机构为阵地,与国民党展开斗争。邓初民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他当时是文工会的兼任委员。从1938年开始到1945年,他在著名期刊《中苏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阐述抗日思想的文章。如《抗战三年来的民主运动》《“九一八”九周年抗战全部历史的重温》《论“日汪条约”》等。《中苏文化》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会刊,这本综合性刊物由翦伯赞任主编。1938年1月,邓初民还在进步综合政论刊物《全民周刊》(沈钧儒主编)发表了《当前的三个问题》。在生活书店出版,沈志远、侯外庐等人主编的《理论与现实》上发表了《论民主政治》《当前宪政之意义》等文章。《全民周刊》与《理论与现实》都是民主党派在抗战期间为宣传抗日救国而创办的,具有极大影响力的进步期刊,《全民周刊》当时的发行量达30万份。与此同时,他还在其他抗战期刊如《战时青年》《战潮》《战时教育》等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中的政治、教育、青年等问题发表了众多时事评论和理论文章,如《怎样实现进一步的统一团结》(1938年)、《战时教育的重新检讨》(1939年)。1940年左右,进步知识分子的学术空间受到国民党的进一步打压,有学者研究“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虽然使得他们的社会活动不再像之前那样活跃,但这也迫使他们转向学校和书斋,郭、翦、侯、吕、邓、杜^⑤等学者此前在党的领导下专注于社会活动及撰写时评,占去了大量精力,1941年以后专攻学术,写就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⑥事实上,这些学者一方面继续深入进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学术研究,诸如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1940年)、《中国社会史教程》(1942年)就成书、出版于这个时期,但同

时,他们其中部分人又以民主党派的身份投入到新的革命活动中。尤其是在抗战后期与解放战争时期,思想界的斗争日趋尖锐和复杂,围绕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政治选择成为舆论斗争和理论论争的核心。邓初民以民主党派的身份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反独裁统治要求民主的革命宣传活动。

(二)邓初民以民主党派政治身份从事的政治传播活动

邓初民是我国民主党的元老,其中一些民主党派重要的参与者与创建者,中央民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40年至1949年是邓初民从事报刊实践最为活跃,也是成就最为丰硕的时期。其中以主编民盟重庆市支部的机关报《民主星期刊》和《唯民周刊》,参与民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的工作最为著名。这一时期邓初民的报刊实践主要反映了他在思想上追求民主反对独裁的目标,在理论上运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革命的自觉。他不仅是《新华日报》《民主报》等进步报刊的重要参与者,还担任了《民主星期刊》和《唯民周刊》的主编,因此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和平台为革命斗争进行较为充分的舆论宣传活动。从其政治身份来看,这一阶段邓初民则主要是在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下进行政治传播活动。

1943年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民主党派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一些著名民主人士以报刊作为斗争的武器,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大量报刊宣传民主宪政。重庆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区域,集结了一批中国知名的文化名人和著名学者,不仅是舆论斗争的核心,也是革命斗争的最前沿。1945年9月1日民盟重庆支部成立,陶行知、史良、邓初民、章伯钧、何公敢等被选为支委委员,邓初民起草了支部成立宣言。“这次改选对于日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重要意义。”^⑦1945年10月1日,民盟中央在特园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增补陶行知、史良、邓初民等33人为中央委员。据邓初民回忆,时任重庆

支部宣传部部长的陶行知将早已酝酿筹办报纸的打算提出和大家商议,并推选他为主编。邓初民因事务较忙,怕耽误此任而一直谦辞,为此陶行知专门和他商谈了两次并亲自到家中邀约。最终,该报于1945年10月1日在重庆创刊,陶行知任发行人,邓初民任总编辑,为扩大影响,他们用航空版的方式先后在广州、桂林、天津、北平、上海等城市发行。“《民主星期刊》在当时的重庆影响很大,和后来创办的《民主报》相配合,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⑤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的张澜为他们撰写了《为本刊的意见代为发刊词》,阐述了该报的办报宗旨:“一个民主的报刊,不仅是要反映、宣传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士的意见,而是要组织、体现要求民主的各阶层人士的力量,使他们能集中起来,步调一致起来。”^⑥《民主星期刊》为四开四版,逢周六出版,属新闻性周刊。在当时思想斗争错综复杂,革命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该刊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及时报道民盟的正确主张,国内民主运动的动态,民盟参与革命的情况,对争取民主和平的活动进行积极的舆论宣传,发表了大量反内战和反独裁的文章。在中国政治道路选择的关键期,这份刊物对当时极具争议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深刻揭露国民党独裁的本质,以求统一思想,达到共识,调动广大盟员反对独裁分裂,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热情。《民主星期刊》的新闻活动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紧密联系。1945年10月,作为中国民盟代表的邓初民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王若飞、徐冰两人会谈,决定交换情报及资料办法^⑦。从而使这张报纸与《新华日报》之间的互动频繁。1945年10月2日该报发行增刊,对民盟中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全面报道,全文报道了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宣言和纲领。在该刊上邓初民曾撰写《中国民主同盟代表什么人的利益》《怎样制止内战》等重要政论文章,回应紧张的政治局势。史良认为邓初民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中的观点说明了“民盟从它开始成立就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在反对派面前,不

同的阶级和社会阶层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联盟”^⑧。此外,邓初民曾回忆,“我还对中间派进行了工作,曾对青年党首领作过批评,又同《大公报》的负责人进行答辩”^⑨,在沈崇事件后,该报又积极参与反美抗暴的宣传活动等一系列国共舆论斗争。与此同时,共产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张友渔等人也经常为《民主星期刊》撰稿。《民主星期刊》及时报道和反映了民盟民主革命斗争情况及其政治主张,同时,也清晰地反映出邓初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道路走向的清醒认识和鲜明态度,在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舆论斗争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史良曾说这张报纸是“民主同盟的喉舌,也是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所有参加者的喉舌”^⑩。1947年2月,邓初民与陶行知先后转移到上海后,该刊仍以他们的名义继续发行,直至1947年6月遭国民党关停。

为配合《民主星期刊》的宣传工作,1946年4月6日,邓初民又创办了《唯民周刊》,共出版40期。这本周刊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宗旨是:“唯民者,就是人民第一,我们的周刊就是为人民说话,说人民不能说的,不敢说的话,我们说。第二,一切向人民学习——这首先就是要不脱离人民。”^⑪体现出鲜明的战斗性和革命性。在这本周刊的创刊号上,首刊了叶挺在狱中的诗《囚歌》,邓初民同时刊发了郭沫若的来信,并配发了自己撰写的编后语,他写道:“这首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这篇文章也包含有深厚的友情,崇高的人格,生命和血在内。”^⑫这一报道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各类媒体纷纷转载。此外,在这本刊物上邓初民运用连载的方式开设了三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专栏,分别是翦伯赞的“历史讲座”、侯外庐的“哲学讲座”以及邓初民的“中国政治问题讲座”,他根据“《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基本精神,多次阐明民主的联合政府是当时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同时对主张走中间路线的“第三方面的人士”进行了分析,指出从政治立场上,只有争取人民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才

有前途”^④。邓初民的编辑方针和办刊内容,使它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舆论阵地。与此同时,这本周刊还是凝聚文化民主力量的重要媒体,邓初民曾向郭沫若、田汉等诸多知名进步作家约稿,发表了大量反映民主思潮和立场的文学作品,如田汉的《雾中散记》、陶行知的诗歌、茅盾的散文,体现出这本刊物办刊特色具有生动活泼的侧面。1947年3月该刊被迫停刊。

1945年之后,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思想论争和革命斗争日趋复杂,中国民主同盟为了及时报道革命形势,反映自己的政治主张,于1946年2月在重庆创办机关报《民主报》。1947年2月《新华日报》被查封时也被勒令停刊。“这本刊物是民盟中央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难的情况下创办的机关报。”^⑤在经济和业务上都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才得以运行。由罗隆基担任第一任社长,马哲民任第一任总编。邓初民与罗隆基、章伯钧、梁漱溟、陶行知等组成社论委员会。邓初民回忆这张报纸说:“它具有鲜明的战斗性,较场口事件当天下午即发出号外。”^⑥同时它还与《新华日报》配合,同国民党及其新闻检查机关巧妙斗争。1946年民盟总部迁往南京后,该刊由重庆支部接办直至1947年2月被停刊。邓初民曾在《民主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第三条道路予以批驳。据《民主报》的冯克熙以及邓初民自己的回忆,他还为报纸的扩版、印刷和经营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

在主办、参与这些报刊编辑活动的同时,邓初民还通过其他报刊进行革命宣传,仅1945年至1948年,他在《文萃》《文汇丛刊》《光明报》《文化周报》《民主》《新华文摘》以及《新华日报》等报刊中发表的文章就达近百篇。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对于中国政治道路的选择存在着巨大分歧,各种政治力量进行着激烈的思想交锋。1947年1月民盟在上海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会上声明继续坚持独立自主政策,在国、共党争中应保持不偏不倚的“第三者”态度。但

是,包括邓初民在内的部分盟员呼吁尽快和共产党形成统一战线。邓初民在《文汇报》上撰文指出,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已容不下中立派或旁观者、调停者或仲裁人了^⑦。在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上发表《中间路线没有现实的根据》以及《再论中间路线问题》等文,重申要尽快摒弃中间道路思想^⑧。通过媒介公开论争,与“中间派”开展了斗争,促进了民盟与中共形成统一战线。

邓初民以传播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核心的新闻传播活动与政治活动,他与各界社会名流和文化学者、共产党人的交往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成为组织、动员、引导民主革命斗争极为重要和活跃的文化群体和政治力量。与此同时,在革命实践斗争的锤炼中也进一步深化和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从而使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的体系化在关注现实、回应时代中更加成熟和完善。1946年到1949年他共出版了4本著作,《世界民主政治的新趋势》《阶级论》《寻找知识的方法》《中国政治问题讲话》。在这些革命传播活动中,他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对于中国政治道路的选择,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都体现出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学者的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

纵观邓初民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中以政治传播为核心的历史面向,不难看出其中所反映出的革命斗争的复杂性、艰难性和曲折性。他的政治传播活动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在革命宣传中融入并提供了学术理论话语,显现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实践的战斗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性。

三、结语

邓初民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媒介实践中具有多元化的身份和多种形式的实践样式。在报刊方面,他作为发行人创办报刊,作为管理者主编报刊,作为评论家撰写评论,作为记者采集新闻。在出版方面,他创办过昆仑书店、文治出版社等,出版了大量马克

思主义著作;同时,作为学者,他又涉猎社会学、政治学、史学等诸多领域,撰写并出版了十多部具有重要学术地位和历史意义的论著。在群体传播方面,他经常发起和参加各种党派、组织、团体等,形成同盟,相互支持和呼应,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群体和传播体系中的核心人物和中坚力量。

邓初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实践活动贯穿于他整个的学术研究和革命历程,是他学术思想和革命轨迹的重要历史侧面,也体现出这一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断求索、斗争,使之获得权威性地位的历史路径。这一历史又深深嵌入和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与中国革命实践相契合的历史规律。邓初民先生一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他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追求真理的学术抱负融入中国革命的现实,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国的话语、立场阐释道路选择,分析中国政治,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更广泛意义上,也显示出这批民主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革命实践对中国道路的自主性建构所起到的内生性作用。事实上,邓初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实践还包含着那个时代,个体与国家、思想与实践、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多重维度和广阔空间,也深刻地展现出一代民主知识分子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担当和国家使命,这些无疑对当下的学术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外,从20世纪初至中叶,现代报刊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种重要新型媒介,得到广泛重视和应用,使之成为进行知识传播和参与政治传播的重要介质。从媒介技术的视角来看,事实上,媒介技术的变迁从一定程度上重新建构了知识的话语范式和秩序,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具有了深入大众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样态。这些传播者,特别是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身处中国

社会革命的历史场景,他们个体的学术思想、话语与媒体实践形成的内在勾联,以及产生的重要成果,是一个非常值得开拓的重要领域。因此,如何从媒介技术的角度,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方面仍有着巨大的学术阐述空间。

注释:

①王冠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初建探析》,《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61页。

②新华社电:《民盟中央社科院等举行学术座谈会纪念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邓初民》,《解放日报》1981年4月8日,1版。

③张友渔:《纪念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邓初民同志》,转引自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页。

④张立波:《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哲学》2007年第2期,第30页。

⑤吕延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与理论成果》,《观察与思考》2019年第5期,第31页。

⑥邓初民生前在他的个人回忆文章中回忆过《民彝》创办的一些情况,讲述该刊刊名的由来。本文直接引用邓初民回忆中的说法,仅以补充现有可公开查阅到的《民彝》的史料,不涉及“民彝”思想研究。

⑦张友渔:《纪念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邓初民同志》,转引自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页。

⑧邓初民:《怎样改造中国》,《新觉路》1922年5月创刊号。

⑨杜任之:《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一生——纪念邓初民同志》,转引自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⑩张友渔:《纪念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邓初民同志》,转引自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⑪张友渔:《纪念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邓初民同志》,转引自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⑫探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的创建,都会追溯到邓初民的《政治科学大纲》这本著作。近年来,政治学研究中,特别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体系和思想史,以及民国时

期中国政治学的相关研究中,对这部著作的历史意义、创作背景都有较为丰富、深入的成果。

⑬王海军:《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探析》,《理论学刊》2015年第12期,第22页。

⑭王冠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初建探析》,《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58页。

⑮《新政治学大纲》由商务印书馆收录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2011年再次重新出版发行。

⑯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07页。

⑰王建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抉择》,《红旗文稿》2016年第18期,第29页。

⑱吴汉全:《邓初民及其〈新政治学大纲〉——写在邓初民先生〈新政治学大纲〉新版之际》,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43页。

⑲王天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语境》,《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0页。

⑳王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4期,第75页。

㉑初民:《政治问题之根本的讨论》,《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9号。

㉒李蓼源:《德教传承仰良师》,《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47页。

㉓邓初民:《改版序言》,《社会科学常识讲话》,北京:文化供应社,1951年,第1页。

㉔吴伯就:《邓初民传》,未刊,由家人保存。

㉕向燕南:《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38-39页。

㉖《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底成立及其纲领》,《新思想》1930年第7期。

㉗史抚民、任守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的意义及其历史地位》,《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第76页。

㉘史抚民、任守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的意义及其历史地位》,《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第76页。

㉙“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简称“自由大同盟”)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个革命团体,1930年2月在上海成立,用以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号召要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

等自由,1931年2月解散。

㉚邓初民:《邓初民回忆录》,未刊,由家人保存。

㉛邓初民的学生杨起华曾在回忆录当中说该刊名为《大声周刊》,但是邓初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未有记录,只说曾办过一个小型刊物。1937年成都的《大声周刊》是车耀先同志主办的一份报纸,邓初民到成都后一直与车耀先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并接受他的指示进行革命工作。作者对杨起华所记刊名现无法进一步确认,可以确定的是此刊与车耀先主办的《大声周刊》为两本刊物。

㉜郭、翦、侯、吕、邓、杜,分别是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邓初民、杜国庠。

㉝谢辉元:《抗战时期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第8页。

㉞史良:《史良自述》,北京:中央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233页。

㉟史良:《史良自述》,北京:中央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233页。

㊱张澜:《为本刊的意见代为发刊词》,《民主星期刊》1946年10月1日,1版。

㊲《中国各小党派现状》,第28页,1946年重庆出版,转引自姜平:《中国民主党派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79页。

㊳史良:《纪念邓初民同志》,《史良自述》,北京:中央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456页。

㊴邓初民:《邓初民回忆录》,未刊,由家人保存。

㊵史良:《纪念邓初民同志》,《史良自述》,北京:中央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456页。

㊶《唯民解》,《唯民周刊》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4月6日),第2页。

㊷《编后语》,《唯民周刊》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4月6日),第16页。

㊸邓初民:《邓初民回忆录》,未刊,由家人保存。

㊹邓初民:《邓初民回忆录》,未刊,由家人保存。

㊺邓初民:《邓初民回忆录》,未刊,由家人保存。

㊻邓初民:《民主同盟与第三方面》,《文汇报》1947年1月10-11日。

㊼邓初民:《中间路线没有现实根据》,《光明报》新21号,1947年7月5日,第4-6页。《再论中间路线问题》,《光明报》新22号,1947年7月19日,第4-8、17页。